



台风过境

董改正

得知台风即将登陆海南时,已是货发的第三天。

我托发货方要来货运公司的电话,打算让他们暂不发货。我拿到电话时,是晚上九点多,已有台风的前兆。天空中黑山一般的云垛子,如同集结待命的魔兽,正在不紧不慢地移动。风狠命摇着窗外的凤尾竹,摧残着歌里的月光和海岛的浪漫。

电话一直没人接,我一个接一个打,直到手机只剩一格奄奄一息的红时,终于有人拔掉了听筒的软木塞,使我高势能的焦急和愤怒可以一泻千里。

“连个值班的人都没有吗?你们这是什么服务态度?货发出了吗?”我把愤怒的集束炸弹隔着波涛汹涌的琼州海峡投向了那个接电话的人。他显然措手不及。

“你说话啊!”

雨已经落下来了。那些黑云垛子忽然坍塌,都化成了石子一般的雨点,啪啪地鞭打着凤尾竹和我的飘窗。天黑得就像一个巨大的墨池,对面楼房中的灯火,就像一个遥远的灯塔,里面的星火,随时可能被风扇灭。

雨声充斥天地间,但电话线仍然清晰无比地将他粗重的呼吸声传给了我。隔了一会,他迟疑地说:“你是哪个啊?”

乡音,一口安庆腔。

“是我。”我用的也是乡音,虽然变了形,相信他能听得出。他也果然

听出来了,显得很欣喜。我对他说,我的货在他的货场,麻烦他帮我放在干爽的仓库里。他连声说“好!好”,我报出货号,他焦急地大声喊道:“那可不妙了,已经上车子了!你是什么货呀?”我说是书,七千多册图书,没有保价运输,湿了就全废了。

电话那边他顿住了。半晌他说:“你打电话前,我们一直在上货,你等等,我去看看。”我没来得及说出谢谢,电话就啪的一声挂了。

肆虐的雨水粘合了天地,风摇撼着小楼,似乎要连同楼基一同拔起,扔到半空中去。我知道台风的中心还未到达,明后天的雨势风势会更惊天骇地,会有几人抱粗的大榕树被折断,街上会布满枯枝败叶,道路会暂时被水统治。

一个小时后,我再次拨打电话,一直打到电话那头疲惫的女声告诉我:“您拨打的电话无人接听,请稍后再拨。”稍后了一个小时,依然无人接听。我放弃了。我原谅了这个老乡,大家都不容易。接我电话前他一直在装货,很有可能晚饭还没得及吃。工人们应该下班走了,他一个人如何在庞大的车子里翻找我那几千册沉重的图书?我只怪自己没有保价托运,接受了白干一年的坏运气。

椰风海韵的夜曲再次伴着凤尾竹上的月光,洒满我的飘窗时,已经是五天之后了。这五天中,我颓丧懊悔。我是两年前来海南从事图书配

送业务的。头一年生意好做时,没有好好努力;第二年各大图书公司登陆海岛,生意已经难做了,却逢着这样糟糕的事情。即使我能拿到最高额三千元的损失费,依然无法改变我将行囊空空的结果。

提货电话是在第八天接到的。带车来到椰海大道货场,找到那家运货公司时,我不敢走过去。司机替我报了单号,打印了提货单递给上货工人。当铲车举着双臂,将一件件干爽方正的图书寄件送到车厢时,我泫然欲泣。

——他一定是一件件替我把货物搬下来,整整齐齐地码在仓库最干爽的地方,等着风和日丽的日子,才装车过海。六十八件,每件百余斤,一个人,风雨雷鸣的台风之夜,不容易。

一直想给他打个电话致谢,也想过以后所有的货物都走他家的物流,但我终于没有打他的电话,也没有照顾成他的生意,因为我决定回去了。经历过那个夜晚之后,害怕了那种浑然无着的漂泊感,一个人在异乡,就像一粒葫芦籽在硕大空洞的葫芦里,不敢晃荡,怕弄出寂寞的声音。

2012年9月16日,我乘车离开海南。我要践行心底的诺言:买点礼物去看看他。在徐闻下车,找到那个物流园和他的物流公司,但接待我的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福建人。我用乡音提问,他眨巴眨巴眼睛,说:“你

说老周啊,一个月前回老家了!”

“有电话吗?”

“没有。”

回乡的车上,我的眼前一遍遍播放着电闪雷鸣狂风暴雨的背景里,他弯腰寻找、吃力搬货的情境。他一定是高瘦的,有着古铜色的肌肤,坚实的咬肌,高高的颧骨。他是我老乡。他与我在同一片土地上长大。我们的根系,或许曾在辽阔的地下相触,所以才会有台风过境的荒古之夜,那种寥廓的情愫,高古的义举。

我不寻找他,只衷心祝他幸福。



董改正,男,1975年生于枞阳,现居铜陵。文学爱好者,主要写作散文,喜欢冲淡平远的文风。有若干作品散见于国内报刊。

瘦在京城

何诚斌

那些年,每次遇见到北京旅游、探亲的老乡,他们都说我瘦了许多,问是不是生活不太习惯?或者“为伊消得人憔悴”?我笑了笑,很不希望自己于人面前露出一副瘦骨嶙峋的样子,但没办法,一到京城没半个月人就瘦下去了。

好的是,我不会老是瘦,回到老家,很快就长膘。在家舒坦,尽管也不停地写稿子,改稿子,但烧饭洗衣不用自己动手。老婆有怨言时,我就狡黠地说:“别看我晃来晃去的,什么也不做,但我脑子里在想文章,这叫‘袖手于前,疾笔于后’。”当然,我常常会觉得她嫁给我这个没什么才气而又乐于卖文为生的男人,算是“嫁错郎”了。我问她:“情愿我在家还在北京?”她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在家好,可是……”对此,我还有什么不能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呢?

一个徐州写手,瘦得弱不禁风。他对我说:“中年男人,在我们那里叫‘驴年’,上有老,下有小,生活担子特别重。”这比喻很形象,从此我也自视为驴。北漂一族,怀揣梦想的人不少,但通过接触,我发现大多数人是因为北京所挣的钱比在家乡挣的钱多而选

择了背井离乡,人生观、价值观与现实生活的冲突,使他们往往不得不像驴子被蒙了眼睛,拼命拉磨。胖驴拉成了瘦驴。我所接触的独个儿在京城打拼的人,还真的没有胖子,个个像瘦驴。这倒提供了一种减肥的方法——漂在异乡,胖子准会瘦下去。

2011年冬天,我与青海籍作家刘兄住在一起。有一天,他得知《十月》第1期发表了他的一部小长篇《漂泊的日子》,一高兴,把自己喝得醉倒在客厅。我怎么也扶不起瘦瘦的他,只得把他的被褥抱过来,铺到地上,然后将他挪到褥子上,给他盖上被子。到了下半夜,他醒过来,大声喊我。我忙起来倒水给他喝。他对我说,22岁的时候,在《青海日报》副刊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巧巧》,拿给父亲看,军人出身的父亲瞪大了眼,说:“你不是抄袭的吧?”他多么委屈和伤心啊!后来,他在《飞天》上发表短篇小说《巧娘》,可父亲已去世,母亲对他说:“儿啊,你把发表的东西收起来,将来得写出跟你个子一样高的书!”多年后,中年的他辞职北漂,写作为生。打拼10年,他用积攒的稿费在京郊房山买了套房子,可是离市区太远,只得又在城里租房住。“十多年来,我用一支笔养活了干瘪的自己。”他说,“我的头发是熬白

的,值得!”我问:“你不用养嫂子?”他说:“嫂子不用我养,她有退休金。”他接着骂起我:“出来漂,就不要老是想家!没毅力的东西,回来不到一个星期,就郁郁不乐!”

我跟许多写手不同,每年都在老家写几个月,然后又到北京写几个月,如此循环。漂友为我接风洗尘的时候,都说我在家养好了,还傻乎乎地问是怎么回事。我说:“你们不是同样瘦在京城吗,还问我?”一个看上去过得挺潇洒的写手说,每次坐上回家的火车,心情特别爽,而一踏上返回京城的火车就紧张起来。大家纷纷说,也有这种感受。对于家室远在千里之外的瘦驴们,一圈磨拉下来,数月半载,紧接着又拉一圈,来来返返,真的是不到退休之年,拉磨不会停止。“你那里,将老年人称作什么?”我问徐州写手。他说:“卸磨杀驴呗,被不孝儿子揩油揩死。”真幽默,大家哄堂大笑。

我在北京常常是跟着别人胡乱吃点,或者一个人随便地弄点吃的,生活很不正常,结果肠胃有了毛病。不少时候,我甚至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关在屋子里写呀,想呀,又写呀,很像《百年孤独》上那个于黑暗的屋子里反复制作金鱼,将金鱼化了又制作金鱼的奥雷良诺,但我却多了一千份浓浓的乡愁,还有一万份沉沉的牵挂。

有一次,我接连多天一个人呆在屋子里,仿佛脱离了人类社会,突然想去看看人,便下了楼。这时,脑子里冒出一句:“想着家乡月山那阴肥的月亮,走在京城这瘦瘦的街道。”这不只是一种心境。不在京城,你体会不到由于车辆拥挤,街道是如何的瘦。不过瘦瘦的老北漂,已经学会了让自己瘦瘦的身子在车辆的缝隙中擦过去的技巧。



何诚斌,1965年生于怀宁,现居合肥。出版散文随笔集《老儿戏》《文心开朗如满月》《皖江历史人物散记》、长篇小说《小柏和外星犬》《跳蚤穿上红衣裙》等10余部作品。

